

◀ （上接 14 版）

说,通过对《刘辟》一文中《韦羽墓志》用典的解读 (79–80 页),与《上官婉儿》一文中《婉儿墓志》排比句式的讨论 (269 页),作者在释出墓志所想传达的志主在深陷浊乱的困境下,选择自裁以明心志的意旨的同时,又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巧妙地指出墓志所真正掩盖的志主的无奈或老道的处世立场。可见,墓志的用典与语言风格哪怕在我们利用墓志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有相当丰富的意蕴的。又如就体例而言,作者在《刘辟》一文中对《薛丹墓志》的分析,特意指出此方墓志为自撰墓志,并将其放在唐代自撰墓志的整体中进行考察,不仅更为深刻地表现了薛丹本人的性格特征,也揭示了一个类似薛丹的重要的中晚唐新型文人群体的面相。

文笔平庸的上官婉儿墓志,虽在具体的史实层面提供不了太多有效的信息,但在与其他相关撰述的反差对比中,我们可捕捉到墓志撰作的用意及其时复杂微妙的政治背景,反倒有助于理解当时紧张的政治情势。梁守谦、刘弘规二位 的墓志与其功德铭及神道碑均有保留,虽然在史实信息与撰作主旨上,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但受体例与功能的制约,不同类型的碑志史料在行文风格与侧重点上仍旧会有不同表现。并且,尽管主旨一致,但撰作者身份的不同,仍可让人在体会这两位宦官领袖性格特征的同时,觉察出他们在当时朝野与舆论中的地位与形象。比如刘弘规的神道碑是由李德裕这位个性孤傲的词臣领袖为其撰作 (89–90 页);而梁守谦在选择功德铭的撰写者时,只是让其副手杨承和撰写,与先时权宦吐突承璀要求翰林学士李绛

撰写圣德碑而遭拒显得截然不同 (140 页)。上文有关《词臣》墓志的讨论,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墓志研究的多重视角。

总之,将墓志视为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史学研究对象,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清流》一书所阐发的对墓志资料价值的重新理解,以及其在实际研究中展现出的灵活多变的使用与理解能力,大大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框架与范畴。不仅是传统上对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变得更为丰满,也开启了对政治心态及更广泛意义上政治文化氛围的探讨。

上文主要就作者的墓志运用情况谈了一些大体的看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无意过度拔高墓志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从《清流》一书来看,其立论基础还是更为系统的传世史料,作者的绝大多数观点也都形成于墓志的刊布与整理成果还未如此丰富的十几年前。事实上,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墓志资料的使用特点,同样适用于传世文献的研究。

比如对西川和浙西事件的解读,就是作者基于传世文献中的矛盾,包括此前未受关注的符载等人的文字,加以重新勾画的。而十几年后出土的多方相关墓志,并未推翻、甚至基本完全印证了作者之前的解释和判断。另外,这篇几乎纯用传世文献所作的研究《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实也是一篇关于政治心态研究的著作,尽管它讨论的话题还是传统的朝藩关系。这篇文章揭示了政治认知的不对等是如何导致朝藩双方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冲突,唐代政治舆论对皇权建设的不可轻视的作用,以及政治原则的突变对当事者与后来者价值观所造成的紊乱。这些层面都是以往我们在藩

镇和朝廷关系的研究中从未考虑的。但恰恰又由于缺乏这样的视角,并且囿于固有的朝藩对峙的政治思维,使我们错过了理解某些重要历史现象的可能。

再比如,和薛丹的自撰墓志展现出这类文人特殊的内心世界一样,传世的《长乐老自叙》也是一篇体现撰作者冯道刻意营造自身形象与反映其自我认同的类似自撰墓志的文字。而相较文笔草率的上官婉儿墓志,由张说撰写的《上官昭容集序》其实更值得关注,因为张说将自身词臣身份的角色想象及“文”的理念,与对上官婉儿的政治定位联系在一起,从而帮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上官婉儿的地位及对唐代历史的影响。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篇序言的修辞手段与唐代其他著名词臣文集序言的相似性 (274 页)。其他方面,包括作者对唐末五代笔记小说作者身份的留意 (257 页),在《宦官领袖》一文中对《李相国论事集》的系统分析 (102–106 页),在在显示了作者处理传世文献的精致入微与超出流俗的眼界视角。

所以正如作者所言,尽管金石资料在现今的唐史研究中可能产生革命性的效应 (88 页),但我们不能迷信这类新出土文献的价值 (265–266 页),看似剩义无几的传世文献,实际上可挖掘的空间还相当大。就作为一种史学研究对象而言,无论是石刻史料还是传世史料,都可以用一般文本理论加以审视,在这方面两者并无二致。只是今天的史家应该超越 19 世纪以来的传统历史编撰理论,在对“书写内容”进行细致考察的同时,也能认识到“书写策略”的价值,从而进一步深入到书写缘由、目的、背景、氛围等的考察中,拓宽政治史研究的内涵。作者的这些认识及运用史料的诸多手法,对当前中古史研究如何激发传世文献的价值、以及如何提高碑志研究的质量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示范效应。

对史料书写内涵作全方位、立体化的考察,这种看似模糊传统学科分类体系下历史学与文学界限的做法,在现今的文史研究中已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史家逐渐意识到,在通过传统考证 (不管是传世史料,还是所谓由出土文献配合的“二重证据”)获得史实的真实性的同时,文本形式的真实性同样也是史学真实的一端。归根结底,学科的分野或内容与形式的割裂都只是科学理性的结果,而不是我们以及古人认识世界的正常方式。所

以,作者采取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从一开始就追求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野,从政治制度、社会心态、文学文化等多角度切入研究唐代政治文化,恰恰是希望以多样化的史料解读视角来呈现一个更为整全与真实的唐帝国。

作为一本被归类于政治文化史范畴的史学研究作品,《清流》一书和国内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叙事史的风格,文史研究的融通,对书写语言的重视,强调对政治机制与过程的考察,关心古人的思想观念与心态感受等等,都使它具有比较明显的新文化史特征。这或许与作者所浸润的西学环境有一定关联。在作者求学北美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独占鳌头、开出一系列似锦繁花时代。如今早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林·亨特、达恩·顿、娜塔莉·戴维斯等,均在这一时期贡献过可能是他们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并呼应着更早时期的汤普森、卡洛·金兹堡、埃曼纽·拉杜里等,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后现代学术浪潮。

这股新文化史的浪潮在欧洲中世纪史及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流风所及中国史领域则是更晚一些的事情,且较多地还是集中在档案文献丰富的明清、民国史研究中。不惟受文献资料的局限使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很难像他们的欧洲史同行一样,施展新文化史的拳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中、日学界,传统深厚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经历“文革”和历史分期论的争论后,此时也才刚刚各安其位或谋求更为深入的发展,更遑论应对西方新文化史的冲击了。所以当世纪之交,国内学界初次接触作者那带有新文化史意味的中古史论文时,即便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学人,恐怕在当时也都多少带有些惊异的心情。

不过在有一点上,作者与国内中古史学界的研究方式还是颇为相似的,那就是在国内最为特出、并与政治史最为密切的制度史领域,《清流》一书不仅表现得毫不逊色,甚至体现了更为扎实的功力和独具慧眼的洞见,我们可以试举几例:比如作者在《刘辟》一文中曾经说到,“阅读唐代墓志等资料所获印象,从京兆府法曹调授,上县县令似为主要的升迁去处之一” (77 页)。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中讨论柳璨的转迁,说“他从光化二年登第到天祐元年正月由翰林学士、

右谏议大夫入相,前后不过四年多,升迁之速,可以说是自李训以来所仅见,完全不合朝廷规则” (216 页)。这些俯拾即是 的论述背景,若没有广泛的史料阅读量和对中古历史的贯通认识是很难得出的。若认真铺陈开来,其实均可以成为有发现的制度史研究。

最后我想谈谈作者为什么要写《清流》一书。在这里,我想提请大家关注《清流》一书的《序论》。和国内相关论著的序论有所不同,在这篇长序中,作者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其研究内容,还非常具体地将其自身研究的心路历程坦诚地描述出来。追寻作者的研究心路,我们发现,尽管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有所调整和完善,但作者的研究兴趣和目的几十年来几乎从未改变:追问唐宋间政治和社会精英所经历的真正的变化。这也正是为何收入《清流》一书中的诸篇论文,尽管有些写作年代彼此间隔有十几年,但全部集中在中晚唐五代,且文章之间的关联性一目了然。

在笔者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家,除了其研究内容要精彩、方法要多样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且这个问题应尽量是一个较为宏大的带有人文关怀的问题。这个问题作者未必要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必须坦诚于自己的内心。这其实也是一个涉及史家责任感的话题。已故的日本中古史学者谷川道雄,曾在论及他们这辈与更年轻的日本学者时感慨道,尽管年轻学者在历史细节的研究中业已取得了超越前辈的成绩,但和他们这辈曾为历史分期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学者相比,年轻学者对宏观的历史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的感伤之情并不来自学界讨论的焦点已从他们这辈学者关心的话题上发生了转移,而是在于,对于他们这辈经历过二战的学者来说,在中国历史分期论话题争论的背后,隐含着他们对同处东亚世界的日本历史、日本国家性质的认识,以及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心。而这种史家的责任与关心在年轻一辈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而在一个早已习惯以材料与课题为导向的研究时代,史家能否重新唤起那种久违的、对解决历史问题保有极大乐趣与信心的情感;能否在对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托历史情怀;也许,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学术“清流”能出现的原因吧。

(作者为中西书局副编审)



冯道像